

绪 论

从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开始，中华帝国与沙俄帝国之间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努力，到 18 世纪初才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是中俄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时期。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的近一个世纪，沙俄帝国逐步演变成苏维埃俄国和苏联。中华帝国则逐步发展为中华民国。这一时期，中俄（苏）两国纠葛不断，纷争频仍。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国才建立起新型的国家关系。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不是一般的国家关系，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几个月前，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宣布实行“一边倒”政策，即倒向苏联，主动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告成立的几个月后，又与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正式结成友好同盟。中国共产党宣布“一边倒”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与苏联结成友好同盟，意味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与正常的国家关系就有很大的不同。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是正常的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互利合作。而中苏两国不仅有共同遵循的意识形态，而且要求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中苏两国虽然也是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既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中国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共产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服从苏联所实行的

内外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经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一定要有一个“头”，即领导者，这个“头”，就是苏联。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91 年苏联解体时期的中苏关系，经历了 50 年代的全面友好合作、60—70 年代的全面尖锐对立和 80 年代的关系逐步正常化等若干阶段。由于中苏两国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以，中苏全面友好合作，是中苏两国之间，也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两国和两党之间战略上的友好合作，也是两国和两党之间在军事上，以至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友好合作。同样，中苏全面尖锐对立，既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基本观点的尖锐分歧，也表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严重对抗，进而表现于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停滞和中断。中苏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的形成，首先是战略上的因素，即共同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行为，其次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其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新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老大哥”的政治认同。中苏全面尖锐对立局面的出现，其原因更为复杂，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而两国同盟本身的结构性缺陷则是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中苏同盟基础的脆弱、构成主体的差异和运作机制的缺陷，是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是国际形势发展和影响的结果，更重要的则是两国和两党内部政策巨大变革的结果。在中国方面，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苏联方面，则是改革和新思维的提出。中苏两国和两党内外政策变革的原因有一致性，变革的方向也有一致性，所以才有了两国和两党之间的相互接近与双边关系的逐步缓和，直到关系的正常化。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印着五星和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落下。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作为其继承者登上世界舞台。中苏关系划上了句号，同时揭开了中俄关系发展

的新篇章。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为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谓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就是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当遵循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它既不同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所遵循的原则很快就被运用于新的中俄关系之中。

苏联解体前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曾出现一定曲折。这种情形持续不久，中国很快就确立了适当的政策，从而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建立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且稳步地向前发展。1994 年，双方提出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而后又提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标志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正式形成。2001 年两国签订《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使这一新型的国家关系在法律上得以确认，十年来，根据新型国家关系的基本定位，两国领导人保持了经常性的国家元首高层互访，两国总理和外长，甚至两国的国防部长之间都形成了定期的对话制度。两国本着求实、认真的态度，经过友好协商，基本上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一重大而又十分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经历了初期快速发展，而后产生曲折，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两国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关于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和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谈判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两国在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另外，两国还积极、妥善地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998 年，钱其琛副总理在回顾中苏、中俄关系的历史时指出：“中苏、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间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①

如同中苏同盟关系一样，中俄伙伴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中苏友好时期自不必说，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有不少人存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情结。70多年的苏联历史很多俄罗斯人都不会轻易忘记。列宁、斯大林等伟大历史人物；十月革命、苏联卫国战争等伟大历史事件；共产国际、九国情报局、经互会等著名国际组织，深深地刻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对于这些伟大人物、伟大事件和著名国际组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也记忆犹新。他们始终非常痛心苏联红旗的降落和苏联的解体。中俄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但由于中苏同盟时期的历史恩怨，使得中俄伙伴关系依然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关系。在俄罗斯，仍有不少人怀念和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怀念苏联时期的大国地位。俄罗斯共产党依然是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俄共虽然根本改变了原苏联共产党的宗旨，但它仍在某种程度上是苏共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依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苏全面友好合作以及双方关系全面破裂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中俄两国领导人和普通民众都不会忘记，从而永远成为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鉴戒。除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之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在客观上有其必要性。从地缘政治因素看，中俄两国是邻国，两国关系在他们各自对外政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都对其国家自身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历史在这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宝贵的经验：两国友好会造福于两国人民，促进各自的稳定和发展；两国交恶会危及两国国家的安全和损害人民的利益，也不利于世界和平。

从国际战略格局看，中俄两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

^① 《人民日报》1998年2月20日。

系，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中俄保持各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保持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而且，中国与俄（苏）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上其他关系有着一定的制约。中俄都是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使命。中俄在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对保持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起积极作用，也会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经贸合作发展看，中俄两国都是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强，而且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已经建立起来的陆运、河运、空运、海运的立体往来格局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设施基础。从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中俄关系建立以来十余年双边政治关系的不断升级，为发展和扩大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俄友好在主观上双方也形成了共识。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迫切需要一个和平与安定的国际环境，特别需要有一个好的周边环境。自那时以来，中国方面对保持和发展中苏、中俄关系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认识到，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都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尽管两国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保持双方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对中国的安全和稳定、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搞好中俄关系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过去，中苏关系正常化来之不易，中俄新型伙伴关系，特别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更加不易，必须十分珍惜，精心维护。为保持和发展两国来之不易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方面曾提出若干保障措施，如：加强相互理解信任，坚持以长期睦邻友好精神处理相互关系中的一切问题；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断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不管形势如何发展

变化，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方针不变；充分利用两国天时地利的条件，积极发展互利互补的经贸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健康有序地开展两国间的人员交往，把中俄边界建成和平、友好、繁荣的纽带；加强相互磋商与合作，共同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1996 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阐述了两国关系的四点基础：第一，中俄毗邻而居，互为最大的邻国，增进信任，保持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第二，中俄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两国目前都在不断深化经济改革，这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第三，中俄都是世界大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助于世界更加繁荣和稳定；第四，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彼此都希望成为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这都是决定中俄关系走向的主导因素”^①。2001 年《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订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又就中俄关系的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增进政治互信，巩固中俄睦邻友好的基石；扩大互利合作，增强中俄共同发展的动力；加强文明交流，增进中俄人民的友谊；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共同致力世界和平与发展^②。2003 年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上任后，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进一步重申：为“加固中俄关系的基础，促进两国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必须做到：第一，加强相互支持，深化政治互信。这是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二，扩大互利合作，实现互惠双赢。双方要拓宽合作领域，探讨新的合作渠道和方式，积极推动大项目合作。第三，拓展友好交往，加深传统友谊。第四，密切沟通协作，促进和平发展。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负有重

《光明日报》1996 年 4 月 26 日。

^② 《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17 日。

大责任。双方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建立国际新秩序、推进世界多极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共同利益，立场相同或相近。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各级别的沟通和协作，并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①

无论是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苏联领导人，还是中俄关系建立以来的俄罗斯领导人，以及苏联和俄罗斯的广大人民，对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性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俄罗斯独立初期曾一度实行向西方的“一边倒”政策，但很快就转变为东西方并重。俄罗斯国徽由单头鹰改为双头鹰，一头朝东、一头朝西就是一个明显的象征。俄总统叶利钦主动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是这种政策转变的结果。促使俄罗斯重视东方，重视亚洲，重视中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是重要考虑之一。亚太地区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地区。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要加快对其落后的亚洲部分领土的建设和开发，必须加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进程。1996年初，俄罗斯宣布要将中国、印度、伊朗作为其在亚洲经贸合作的主要目标。当时，俄罗斯加入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目标遇到一定的阻力。为此，俄罗斯一再表示希望中国帮助其实现这一目标。其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大大下降，使俄罗斯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俄罗斯不甘心屈居为二等伙伴并受人摆布，因而想恢复其昔日大国的风采，在地区及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中国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助于俄罗斯抗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现其重振雄风的目标。而且，俄罗斯有关专家认为，同中国友好可以使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他们认为，决定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同东方邻国，首先是同与俄有着最长边界的国家——中国的关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达连科明确

^① 《人民日报》2003年5月28日。

指出：“在目前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对俄罗斯的利益和困难表示一定理解，并表示准备扩大与俄罗斯平行合作的大国。苏联解体后，中国没有从事任何可以被指责为旨在利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来反对俄罗斯的行动。”^①

1996 年，俄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时主动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中国方面的赞同。一年后，叶利钦在接受中国记者访问时进一步说明：“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既反映了我们两国关系的现状，又展示了这一关系的前景。我们在最近几年取得的共同成就，是高度的信任，首先是最高级的频繁对话。我们的坚定意愿是发展这种对话。”他还说：“同中国的睦邻合作，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独立的优先方面，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质，不受一时的政治因素影响。”^② 2000 年，普京总统刚上台就指出，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俄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两国人民世代代毗邻而居，历史上两国曾并肩解决过一些共同问题。当前以及今后，俄中发展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将成为维护全球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在新的世纪将继续得到发展，俄将继续积极发展与伟大中国在经济、文化领域和国际问题上的合作^③。2002 年 5 月，普京再度指出，不应忘记，“俄罗斯的巨大利益还集中在东方”，并称中国是俄罗斯的“关键伙伴之一”^④。

季达连科：“面向 21 世纪的互利伙伴关系”，徐葵、马胜荣主编，《跨世纪的战略抉择——90 年代中俄关系实录》，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3 页。

^② 新华社莫斯科 1997 年 11 月 7 日电：“叶利钦总统接受中俄记者采访时强调加强俄中关系，开拓合作领域”，徐葵、马胜荣主编：《跨世纪的战略抉择——90 年代中俄关系实录》，第 77 页。

^③ 普京：中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2000.07.17 11:05:07）。
<http://202.84.17.11/world/htm/20000717/19910.htm>。

^④ 普京谈对外政策：国家利益第一中国是“关键伙伴”。
<http://news.sina.com.cn/w/2002-05-27/0438587053.html>。

从中苏关系正常化到《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签订，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中俄（苏）关系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消极因素。经贸关系发展的曲折及其与政治关系的不平衡发展是中俄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中俄关系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表现是俄罗斯国内部分人夸大中俄经贸交流和劳务合作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非法过境、过期滞留的无序现象，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中国人一直把俄罗斯远东部分视为应属于中国的领土，从而企图以大量非法移民的人海战术改变远东地区的人口构成，争夺西伯利亚远东的主权。他们声称在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中国人已有百万之多，认为数年后中国人很可能成为对俄罗斯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这些看法实际上是夸大事实和错误的猜疑。早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两国之间就签订了边界协定。中俄关系建立后，双方对中苏两国签订的边界协定予以确认，对领土划界问题愿从根本上给予解决。中国政府是讲信义的，目前和将来都会尊重和遵守协定。对于中国非法移民问题，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并与俄罗斯方面积极合作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坚决打击从事非法移民活动的犯罪分子，不允许中国公民做有损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事情。由于双方政府的正确态度，这一问题没有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但是，如果俄罗斯国内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一时占了上风，掌握了权力，这个问题有可能被利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

1996 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后，两国政治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但经济贸易关系却长期停滞不前。直到 2000 年以后，两国经贸关系才有所突破：2000 年两国贸易额达 80 亿美元，2001 年达 106 亿美元，2002 年达 120 亿美元，但始终没有达到 1996 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所定的两国贸易额 200 亿美元的目标。而且，在所达到的贸易额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方的贸易逆差偏大。如 2001 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为 52.5 亿

美元。2002 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为 48.9 亿美元。2003 年，两国贸易额又有较大增长，达到 15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其中中国出口 60.3 亿美元，增长 71.4%；进口 97.3 亿美元，增长 15.7%。中国逆差仍有 37 亿美元，同比减少 24.3%^①。这种不平衡的国际贸易在两国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代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因为存在过多贸易逆差的一方会逐步失去进一步发展贸易的动力和积极性^②。近年来，两国虽然在努力扩大贸易额和贸易关系水平，特别是争取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方面有所突破，但始终成效不大。2003 年 5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时曾与普京总统专门就能源合作，主要是建立中俄石油管道以促进两国贸易关系发展问题进行磋商。但在 2003 年下半年传出来的却是中俄建立石油管道的不利信息，这将严重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

边界领土划分问题是中俄关系中的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弄不好，很容易出现问题从而影响两国的关系。1991 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2 年初俄罗斯予以承认）和 1994 年中俄国界西段协定的签署，使两国边界 90% 以上的部分已经划分，边界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遗留的问题是中俄东段边界仍有 3 个岛屿的归属存在争议，特别是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战略地位重要。苏联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才占据该岛。该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应该属于中国。苏联当年刚刚占领该岛时，中国政府曾与苏方进行了外交交涉，明确表示该岛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苏联对该岛拥有主权。如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致意并声

① <http://cn.ruschina.net/rvoe/hgtynbvruj/ffdswert/vftrtgfrtgfb/>。

② 如在 18 世纪时，就是因为中国清朝政府与俄国的贸易逆差过大而失去与俄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兴趣，从而导致中俄两国政府在中国首都北京所建的贸易中心解体。

述”：“苏联军事当局，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军队公开侵入中国东三省以后，乘中国军队岗哨被迫自合江省抚远县黑瞎子岛撤退之际，曾派兵占据该黑瞎子岛，在最近十余年之期间，苏军继续占据该岛，并建筑工事与营房等各种军事设备。查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合流处三角洲地带，为三个不等形之岛屿所组成，依照 1858 年 5 月 16 日《璦琿条约》及 1860 年 11 月 2 日《北京条约》之规定，该黑瞎子岛系属中国领土，苏军在该岛之驻扎显属非法占领，中国政府自不能予以同意。中国政府除俟环境许可再行详查事实外，兹声明保留关于此项问题日后查实时向苏联政府提出一切有关要求之权。”^① 由此开始，黑瞎子岛成为一个外交悬案，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于这一事实，中俄（苏）双方都是清楚的。

在俄台关系上，台湾当局为实现其重返联合国的图谋，极力利用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吸引俄罗斯朝野人士的注意，并积极发展科技、经贸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扩大在俄罗斯的影响，待机使关系升格。俄罗斯方面也有人响应并迎合台湾当局的这种活动。2003 年上半年，谈判多年未成的台北与莫斯科之间的直航得以解决。双方之间开展了许多重要的交流活动。如果是纯商业和贸易关系，尚不会有多大问题。但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可避免。一旦有人不能正确对待或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发生伤害两国友好关系的政治风波。

1996 年，我们在撰写《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一书时写道：“俄罗斯是中国的最大邻国，中俄关系在中外关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俄关系是在中苏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苏关系研究是中外关系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也是中外关

内政部文外交部苏军占黑瞎子岛一案，《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一册：东北卷，外交部编，中华民国 90 年 12 月，第 365 页。

系研究的薄弱环节，加上中俄关系刚刚建立，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许多外交态势尚未定型。在这种条件下研究中俄关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①现在看来，以上判断仍然没有过时。中苏关系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随着苏联档案的逐步解密，俄罗斯和西方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屈指可数。中俄建交虽然已有十来年的历史，但其外交态势仍然不能说已经定型。虽然中俄两国在 2001 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明确中俄两国之间要“世代友好，永不为敌”，但实际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②。中俄两国之间在建立石油管道问题上的曲折就是证明。因此，两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要靠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艰苦努力。

所幸的是，自 2001 年《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中俄双方以有关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谈判，终于就额尔古纳河上游阿巴该图洲渚和黑龙江中游黑瞎子岛的两个地段的边界问题达成协议。2004 年 10 月 14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两国正式签订《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该协定最终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得以解决的外交悬案，成功解决两国间复杂而敏感的边界问题，为中俄各领域关系的全面发展消除了一大隐患。此协定与此前签订的国界协定一起，标志着 4300 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中俄联合声明指出：这是中俄双方“政治双赢的均衡合理的方案”；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睦邻合作的可靠保障，是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安全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界争

① 刘德喜等著：《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 页。

② 2003 年 8 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古昌在黑龙江召开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仍然要求学者研究如何确立中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端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并将丰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①就在这次普京访华时，两国元首还批准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05—2008）。所有这些，标志着中俄两国关系的前景看好。

^① 《人民日报》 2004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

第一章 中俄（苏）关系的历史由来

一、中俄两国的早期接触和外交关系的形成

1. 中俄关系的起源和双方的早期接触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俄罗斯则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早在公元前 17 世纪前，中国就在东亚的黄河流域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直到公元 9 世纪后，俄罗斯国家的前身——基辅罗斯才逐步形成。而且到 13 世纪时，基辅罗斯又被蒙古的铁蹄踏灭。整个俄罗斯地区从此成为蒙古人的殖民地。蒙古人统治期间，俄罗斯人虽然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公国^①，但直到公元 15 世纪 80 年代，才脱离蒙古金帐汗国的羁绊获得独立。而且它只是一个地处东欧一隅，面积只有 280 万平方公里的封建小王国。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兼并俄罗斯地区各公国，建立起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1547 年，号称“全俄罗斯大公”的莫斯科公国统治者伊凡四世宣布以“沙皇”作为自己的称号^②，从此，莫斯科公国演变成沙皇俄国。由此算来，中俄两个国家的形成大约相差三千年之久。

然而，新兴的俄罗斯国家形成伊始，就与中国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是由当时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来实现的，所以说，这时，古老的中华帝国与新兴的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联系。由

^① 公元 1328 年，莫斯科公国首领被蒙古统治者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

^② 意思是与以前的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并列的“第三罗马帝国”。

于蒙古人既占领了当时的中国，也占领了当时的俄罗斯，所以，“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中国与俄国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架起了间接交往的桥梁”。由于这一“桥梁”的作用，一是“中俄双方的人员往来开始出现”。如在蒙古人西征队伍中，有汉人医生和歌女随从，汉人工匠建造的弩炮、飞箭和火炮，在攻破莫斯科等城池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批被蒙古人掳掠到东方的俄罗斯军士被安置在中国北方从事屯垦。当时，蒙古人建立的元政府还在北京设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鲁斯（即俄罗斯）军士”^①。当时在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居地。^②二是“中俄之间的商务关系开始萌发”。当时在莫斯科，来自中国北方的商队频繁出现，他们携带中国的丝棉、金绵、茶叶和日用器皿等，换回当地居民手中的物品。三是“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产生”。许多罗斯封建主穿戴起东方式的服装。中国人饮茶的习惯由蒙古人带到了俄罗斯。中国的算盘也在 14 世纪时传到俄罗斯，直到 20 世纪初仍是那里的妇女用作计算的工具。此外，当时的俄罗斯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曾派人到中国学习医学，为西方人治疗天花等疾病，学习中国发明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方法，介绍到西方，并用活字印刷出第一部拉丁字母的《圣经》^③。尽管如此，这时的中俄双方仍没有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因为双方根本就不存在明确的国家认同，在蒙古统治者看来，中国和俄罗斯不过是一个统治制度下的两块地域。

上述中俄双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而中

吴克明著：《元史》卷三，《文宗本纪》。转引自《俄国东正教侵华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 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5 页。

③ 胡礼忠等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 页。

断。那时，取代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明王朝与蒙古人金帐汗国属下的莫斯科公国之间的关系处于隔绝的状态之中。直到两百年后的 16 世纪下半叶，沙俄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后，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才与“截然不同于西部和中部西伯利亚游牧民族的邻邦中国，面对面地相遇了”^①。这时，新建立不久的沙皇俄国已经将中国作为一个他们力求与之建立联系的国家了。但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当时在莫斯科，人们对于俄国东部边界和明帝国之间的辽阔土地几乎一无所知。由于缺乏确切的知识，便产生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中国是在鄂毕河发源地附近的某个地方，通往中国的道路也推想为比它的实际要短”^②。为此，沙俄政府极力通过其新征服的西伯利亚地区政府探索与中国联系的途径。

大约在 17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武装分子在向东扩张的途中最早遇见了中国的蒙古族牧民，即当时属于中国的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游牧地。17 世纪 40 年代沙俄武装分子抵达太平洋沿岸时又与中国所属的黑龙江流域诸民族发生了直接接触。沙皇俄国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与中国的接触方式“有武力的也有外交性质的”。总的来看，是以武力方式为主，以外交方式为辅。然而，无论是武力方式，还是外交方式，沙俄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了吞并和占领中国北部地区的领土，在一定时期，也有重要的商业和贸易目标，中国的目标则仅仅是为了保住已有的领土不受侵犯，有时甚至不惜以割让领土为代价，以保住国内安宁和边境的稳定；无论是武力方式，还是外交方式，沙俄都处于攻势，中国则处于守势。

17 世纪初，沙俄帝国与中国的直接接触一开始就发动了强大

^① [法]葛斯顿·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5 页。

^②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题译小组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4 页。

的外交攻势，首先是对中国西北部地方政府的外交攻势。1607年1月，沙皇就命令新征服的西伯利亚地区塔拉统领加加林派遣使团到中国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两部，说服他们臣服沙皇，转入“俄国籍”。1609年，沙俄政府再次命令塔拉统领派出使团，引诱厄鲁特首领亲自到莫斯科去。^①与此同时，沙皇新征服的西伯利亚地区托木斯克统领沃伦斯基则根据沙皇的谕旨派出一个伪装的贸易使团，去“访问”乌布苏湖游牧地的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中左旗琿台吉硕垒乌巴什（俄国人称为“阿勒坦汗”，即“黄金汗”），并希望通过他们去北京，以建立双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路遇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交战，该使团返回，仅了解到阿勒坦汗和北京的一些情况。

也是在17世纪初，崛起于西方的海上强国英国对俄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希望通过俄罗斯新征服的西伯利亚探寻到中国去的道路。沙俄政府虽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但英国的压力却促使他们自己“派遣各种探险队去探索从西伯利亚城镇到中国去的道路，并了解中国有多富，有多大”^②。

根据莫斯科的旨意，1615年在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组成外交使团，其主要任务：一是与阿勒坦汗建立友好关系，并说服他们宣誓效忠俄国沙皇；二是开辟一条去中国首都北京的通商道路。该使团于1616年成行并抵达中国北部喀尔喀蒙古阿勒坦汗处（即科布多地区）。使团劝说这个蒙古王“臣服沙皇陛下”。阿勒坦汗一方面特别重视这个出现在北方的强大的邻国，并用很高的规格接待该使团，但他却认为：“没有宣誓效忠沙皇的必要，他只力求同强

傅孙铭等著：《沙俄侵华史简编》（增订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4—5页。